

# 系统观念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

杜仕菊 程明月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系统观念是把握复杂性现象的科学思维方式。掌握系统观念并将其贯穿至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可从三个维度展开:以整体性思维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变化,包括国内外“两个大局”和经济社会内部的“常”与“变”;以过程性思维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义,包括目标之间内在贯通和党的领导作用;以开放性思维预判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包括面向国际的空间开放和面向未来的时间开放。系统观念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焕发的活力必将推动中国发展走向世界。

**[关键词]** 系统观念; 复杂性; 经济社会发展; “十四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09-2528 (2021) 03-051-006

DOI:10.16580/j.sxlljydk.2021.03.008

系统观念是把握复杂性现象的科学思维方式,可以透过复杂繁多的经验表象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本质是唯物辩证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首次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的原则,包括“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等具体内容。这种系统观念对于国家“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 一、以整体性思维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变化

源于古希腊语的“系统”一词,有部分构成整体之意,因而整体思维是系统观念的核心命题。钱学森也曾认为,系统思维的第一要义就是从整体上认识和解决问题,<sup>[1](P179)</sup>其对立面则为近代社会发展由分工造成的“片断思维”。整体性思维作为正确的世界观有助于辨明社会经济发 展的实然和应然意义:就实然层面而言,整体性思维在《建议》中体现为对“两个大局”所作的准确研判,同时也贯穿于对国内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的非均

衡把握;就应然意义而言,整体性思维体现为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预判,即要求处理好社会发展“常”与“变”的关系问题。

### 1. 实然层面,整体性思维体现为统筹“两个大局”变化

《建议》中明确对中国社会当前和今后发展的环境作出判断,即“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sup>[2](P4)</sup>这一整体性思维是对将国内和国际环境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纠偏。

第一,要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此消彼长的百年。对于时代方位的研判始终是解释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原点,从20世纪以来的数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可清晰勾勒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脉络。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启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成为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现代化”模式的高地,西方文明也被黑格尔作为世界文明进步到极致的表现,“世界历史”不过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史。尤其到了20世纪后十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断言世界历史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之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建制中。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所表露的国家治理模式衰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叙事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转变，即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倡议参与全球交往，进而成为内嵌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推动力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同时呈现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则彰显不同制度共存以及新的世界历史局面开启的可能性，<sup>[3]</sup>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sup>[4](P10)</sup>因而若仅仅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作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衰败或者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壮大就会陷入社会发展的“决定论”。

第二，要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并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机遇，但以整体性思维观之，我们不能忽视与机遇并存的风险挑战，因而必须“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从风险类型上看，新时代以后的风险更呈现为系统性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就是将各种风险视作一个系统体系，这就要求不能单向度看待国家安全的问题；国际层面除了有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围堵以外，各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再加之“黑天鹅”“灰犀牛”等不确定事件的叠加使得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多发，因而防范风险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那种只看到机遇而忽视潜在风险的“片断性思维”容易使实践主体陷入一种乌托邦的“唯心主义幻象”，进而导致忽视社会发展规律。

## 2. 应然层面，整体性思维体现为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常”与“变”的关系

如果说“两个大局”的分析主要针对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方面，“常”与“变”则指以整体性思维之“常”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之“变”中。当前越是面临日益复杂外部发展环境

和内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面临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纵深发展的任务，就越须遵循整体性思维的内在规律和实践要求，这里的整体性思维是建基于历史进步之禀赋逻辑前提上的人类思维规律。客观物质世界中“不确定”作为“变”的内核构成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其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在“变”中看到“常”勾勒出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轨迹。换言之，整体性作为一种“亦此亦彼”思维，既能够拨冗社会经济发展的纷繁现象，又能从中把握历史前进的趋势。

一方面，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当人类从传统社会中“自然本性”主导的秩序中走出时，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便被抛至不确定的世界中。不确定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尽管也具有必然性，但自然界惯常秩序和内在规律变化的“不可控性”并不会动摇“本体性安全”的外壳；而现代社会以后，主体认知结构的持续扩大使得“理性消除不确定的努力持续造就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sup>[5]</sup>概言之，这种不确定更多是由主体本身的实践活动所造成。不确定性的存在尽管在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表现各异，但同样具有必然性和绝对性。

另一方面，应当以历史哲学中进步禀赋之“常”应对不确定之“变”。无论是黑格尔曾经将人类社会视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抑或恩格斯关于“历史不过是表现着人的目的的活动”的表述，实质上都将人类社会视作不同主体目的表达和实现的场域，既然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因而“贯穿其中的历史理念正是人的理性从‘自然’走向‘自由’的不断推进，展示的是人类道德和制度文明的不断进步”。<sup>[6]</sup>只有看到社会进步之常态，才能使主体有足够信心直面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相反，如果只以片断性思维看到作为经验表象之“变”，那么社会发展不仅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也将面临“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sup>[7]</sup>的论述，鲜明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变”中之“常”。

以整体性思维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的意义在于，社会发展作为有机系统，对经济活

动的规划必须从整体上加以设计和考量, 毕竟与现代社会发育初期相符的机械论和还原论思维, 也在历史前行过程中随着现代社会内部的成熟展开了自我否定, 即复杂性社会呼吁整体性思维方法论的到来。

## 二、以过程性思维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要义

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复杂的有机系统, 过程性思维或者说动态思维是理解其生成和发展的科学思维方式。机械论自然观从封闭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出发, 将整体功能作为各个部分功能叠加, 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构成论; 而过程性思维不仅强调开放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的生成, 更为关键的是此种生成本质上是演化而非存在、进化而非退化。如果说以上讨论仍然停留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层面, 那么以过程性思维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离不开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建议》中制定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 2035 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在凸显社会发展作为过程性和阶段性的同时, 更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的主观能动性。

### 1. 过程性思维体现为“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内在贯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到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何目标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 其中必定经历动态发展过程, 这就意味着任何阶段性目标具有的科学性都并非绝对真理, 而是要因时因地作出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

一方面,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 2035 年远景目标提供前提条件。从历史逻辑来看, “十四五”规划纲要与之前五年规划一样, 皆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链条上的一环, 但不同之处在于提出背景已然有了重大的时空转化: 不仅包括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 更标识着十九大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建基于更高的历史起点和发展实践上。新的实践当然呼吁社会发展的更高目标, 正如《建议》中所言,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目标应当“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sup>[2](P8)</sup>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为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实现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 2035 年的远景目标为包括“十四五”规划在内的三个五年计划提供参照系。一个远景目标要通过阶段性发展目标来实现, 这个过程是在保持社会结构有序状态下的渐进式质变, 即从原有社会稳态发展到新的稳态。可将三个五年计划作为总体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组成结构, 结构之间的稳定性关系保证了社会的有序运转, 离开稳定谈有序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毫无意义。尽管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对于“十四五”规划而言是远景目标, 但这一目标深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过程链条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为两个阶段, 其中“第二个阶段,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sup>[5](P29)</sup>可以说, 《建议》中指明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既立足近期又谋划长远, 中国社会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行稳致远的发展、推进各项蓝图的具体实践。

### 2. 党的全面领导使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呈现“秩序”与“活力”

这里主要是就社会发展的经济层面而言, 经济发展对于任何社会而言都是第一要务, 任何文明缺少经济发展就会丧失自身基础, 因而这里所说的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所呈现的“秩序”与“活力”也是就社会经济系统运行过程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建议》中将党的全面领导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的原则, 新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和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如果离开这一前提, 不仅社会发展由于缺少主观能动性而与自然发展无异, 而且经济发展本身就会陷入“只见物而不见人”, 即偏离“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就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发展而言，两者皆具有作为“自组织”系统内蕴的上升性和前进性趋势，但由于前者涉及党的领导力量进而使发展过程与后者相异。事实上中国社会由传统走上现代化是一个由支撑性主体力量外在推动的发生过程，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将社会发展等同于“人定胜天”，而是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支撑性主体力量下“秩序”与作为自发秩序市场客观运行规律“活力”二者的相得益彰。经济活动尽管作为社会历史领域中主体的创造活动，不能忽视其奠基于市场自发运行规律客观性之上的科学性，哈耶克正是看到这点进而提出“自发秩序理论”，即“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sup>[8](P12)</sup>但他的理论的谬误也恰在于此：肯定市场自发带来的活力而导致一概否定主体在维护社会运行秩序上的能动作用。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市场经济运行中总是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避免社会发展陷入“听天由命”的自由放任主义或者“人定胜天”的计划主义经济非此即彼局面，只有通过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立一种“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局面，因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sup>[9]</sup>《建议》中将处理“秩序”与“活力”的问题表述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sup>[2](P17)</sup>

此外，中国共产党坚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规避了经济发展沦为“见物不见人”的状态。经济学作为由人的活动产生的学科，应当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双重统一，即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自组织”系统的统一，然而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却是试图祛除价值判断的过程，进而试图通过这门“社会物理学”实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精准预判。尽管西方经济学将其逻辑起点奠基于“理性经济人”之上，但作为分析单位的“经济人”由于未处在社会联系中，进而使得人类活动与动物的觅食过程无异，<sup>[10](P460)</sup>此种情景下经

济系统仍不过是达尔文进化论式的隐喻，但对于现实尤其是后现代化国家而言，依靠“市场”自发力量能否带来可靠物质进步却值得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进而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比西方经济学仅将人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剧中人”和“经济人”，这里的“人民”概念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导演人”和“社会人”，即“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sup>[11](P96)</sup>而隶属于复杂性科学的过程性思维方式在解释自组织系统对经济学的突出影响正在于，将人的因素和立场置于经济发展中的支配地位，从而将经济学从单纯的科学上升为关怀人的价值的科学。既然在西方社会结构中的市场自发秩序不能孕育出经济学的价值关怀，那么只有依靠人为努力去构建一种组织力量，这种组织力量因具有强大的领导权威自上而下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从而“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sup>[2](P7)</sup>

### 三、以开放性思维预判经济社会发展前景

社会有机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形塑是系统发展的前提条件，即发展需要以开放性为前提。尽管当代科学对于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有了进展，但哲学层面认识发展的前提条件——开放性，也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开放性对于系统不能发展具有普遍判定作用，对系统能发展却不具备这种作用，这提示我们开放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预判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说整体性思维、过程性思维侧重“发展”对系统内部的要求，那么开放性思维则是“发展”对系统外部边界的要求。20世纪以来熵增定律等科学已经否定作为封闭和孤立系统进化之可能性，因而“将系统观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必须树立开放意识，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立足国内与全面开放相统一”。<sup>[12]</sup>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开放性思维意味着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入手：

## 1. 开放性思维意味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国际的空间开放

《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sup>[2](P6)</sup>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中国以开放性思维主动应对国内外的环境变化，同时意味着从“以外促内”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内促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是中国主动应变而非消极被动的选择。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纵深推进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拒绝谁”，然而与资本主义开辟的初期世界历史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自身的经济发展活力和发展方式呈现崭新的世界历史图景：在自身市场地位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同时，也以更为开放姿态迎接世界风险挑战。面对“灰犀牛”“黑天鹅”等不确定风险造成全球经济疲软局面，中国为应对危机和挑战主动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战略，进而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主体，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sup>[2](P53)</sup>是在进一步开放中重新布局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发展格局遵循着现代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具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厚的历史逻辑，因为一国经济成长必然要经受“由外促内”到“以内促外”的转变。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经济依托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但由于技术和管理要素的匮乏使得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并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这一局面导致全球市场变化制约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建立安全可控和以内为主的经济体系才有可能规避上述问题出现。事实上早在“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调整传统“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扩大内需、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问题都旨在促进强大国内市场形成，因而新发展格局是与上述相关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力量

的强大使得我国有能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成更高水平开放格局进而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推动力，正如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演讲强调的：“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sup>[13]</sup>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或闭关自守是无济于事的，闭关锁国曾使我国远远落后于同时期其他国家发展水平，正是通过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才重新释放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活力。

## 2. 开放性思维还意味着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面向未来的时间开放

经济社会系统不仅是面向空间开放的发展，也表象着时间开放，就后者而言，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是时间开放性，即系统面向未来的发展。《建议》的说明中内蕴时间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为“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衔接”。<sup>[2](P50)</sup>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向前承接全面小康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向后又开启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因而“十四五”时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传统社会或者自然共同体中，主体在自然时间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或者说经济活动更多呈现为“集体无意识”特征，因而自然或者人类社会的成长和衰落在漫长自然时间中未曾出现“本质性”断裂，并表现为世世代代的“相似性”，造成此种缓慢发展的原因在于自然时间并不具有开放性。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时间的开放性为条件，这种开放不仅体现为回望过去、立足当下，更要紧的在于能够对未来社会发展秉持历史进步的哲思，原有的自然时间在生产力和人类主体意识觉醒下被翻转为具有开放性的社会历史时间。

进一步来说，面向未来的时间开放之所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如此重要，在于这一时间实际标识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历史特殊性与历史普遍性二者“合力”中的推进。尽管当今世界历史仍在前进中客观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社会主体中殊异利益冲

突的自然消失,相反,现实中越是出现对抗的社会关系,出现资本对他者的压制,或出现财富占有导致的主体自我冲突等特殊性的充盈,社会发展就越是在呼吁一种未来历史进步性对此加以提升。但肯定未来历史的时间开放性并不等于否认当下或者过去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说未来历史时间是“目的因”,那么过去或者当下时间实际上则是内嵌于其中的“质料”,对于每一方的肯定都要以另一方为前提,否则就会出现下述清醒:没有过去或当下的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是“空洞”的,而只囿于当下和过去却不面向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则是“盲目”的,这种盲目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失序或者不安全状态。而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也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因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正因如此,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sup>[14]</sup>

系统观念与复杂性系统科学相伴而生,是对复杂性现象加以把握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相较于自然界“自组织”系统,经济社会由于涉及人的实践活动、价值立场而更加复杂,而对其研判同样离不开系统观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换言之,系统观念阐明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中长期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了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我国仍将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持续推进系统观念的中国实践。

#### 参考文献:

- [1]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3] 杜仕菊,程明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起点、要义及愿景旨归[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6).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 王小章.风险时代的社会建设[J].浙江社会科学,2010,(3).
- [6] 杜仕菊,刘林.“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赓续与延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2).
- [7] 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0-11-20(2).
- [8]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0-12-19(1).
- [10] 马涛.经济学范式的演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2] 蔡文成.坚持系统观念,谋划和推动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0-11-13(6).
- [13] 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0-11-20(2).
- [14]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责任编辑:徐小梅